



#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Liang Qichao's Memorial Library Thought an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姬秀丽 (泰山学院图书馆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 梁启超赋予近代图书馆多元的功能,提出了为爱国英雄和著名学者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思想。他认为纪念图书馆是纪念馆和通俗图书馆的结合,既可以培养国民公德,又可以开启民智。在新时期,分析、研究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在馆藏建设、经费来源和管理模式方面的经验,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纪念图书馆 图书馆思想 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Liang Qichao has given the modern library diverse functions, and presented memorial library thoughts which advocate establishing the memorial library for patriotic heroes and famous scholars. Liang Qichao believes that the memorial library should be the both hall of the fame and the general library, it could cultivate the national morality and wisdom. In the new period, analysis and researches on Liang Qichao's memorial library thoughts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fund sources an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memorial library have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today.

[Key words] Memorial library; Library thought; Liang Qichao

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倡导者、组织者、实践者,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贡献不仅仅限于目录学、文献学等领域,他还赋予了图书馆多元的功能,提出了“纪念图书馆思想”,并创建了以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的表字命名的松坡图书馆。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纪念图书馆,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目前,学界对梁启超创建松坡图书馆的研究颇多,但多侧重于实践材料的罗列,对其纪念图书馆思想则少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其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分析,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 1 梁启超纪念图书馆思想的形成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深,感于“民智”的低下,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对民众素质的强调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是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他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sup>[1]</sup>,把如何启蒙、教育民众作为急迫的思考课题和行动目标。并且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梁启超开始

了对图书馆功能的思考和探索。

创办万木草堂书藏是他涉足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中,梁启超介绍了西方图书馆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即“伦敦大书楼藏书至五千余万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藏书楼,其藏书至数十万卷者,所在皆是。举国书楼以千数百计,凡有井水饮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此所以举国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sup>[2]</sup>因此,他与二三同志,聚书而成万木草堂书藏,“以饷戚好中之贫而好学者”,希望能有力于养成其才,“以备国家缓急”<sup>[2]</sup>。1895年7月,梁启超在北京主持维新运动总机关——强学会时,设立了强学书藏,“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知识于我国民。”<sup>[3]</sup>

在对近代图书馆的探索性实践中,梁启超也在不断地总结其图书馆观念。1896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

\* 本文系山东省文化厅2011年度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我国名人图书馆的现状调查与建设策略分析”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1244。

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sup>[4]</sup>所谓书籍馆即图书馆。在梁启超眼中,作为强国智民的重要机构,图书馆的地位与学校和报纸同样重要。1899年6月,梁启超在其主办的《清议报》上转载了题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罗列了图书馆的八大利益,认为图书馆不但能“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辅助其知识之利”,也能“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还能“使阅览图书者得加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sup>[5]</sup>。这表明梁启超已深刻意识到了近代图书馆是具备普及知识、传授技能等开启民智功能的社会教育机构。

通过这一阶段的实践,梁启超对图书馆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书本的介绍。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2—10月,梁启超赴美洲访问,回来后满怀激情地撰写了访问的见闻与感受——《新大陆游记》<sup>[6]</sup>。全书篇幅不长,却4次记载了美国近代图书馆的现状,涉及办馆模式、建馆规模、经费来源、管理方法、服务手段和社会赞助等多方面内容,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美国近代图书馆的面貌,使他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由抽象到具体<sup>[6]</sup>。其中,尤其详细记载了钢铁大王卡内基多年来捐助图书馆的事情,如“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时,未尝得受相当之教育,惟余所至各市,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sup>[6]</sup>。卡内基这种私人捐助建馆、用个人名字命名图书馆以纪念其善行的方式带给梁启超很大的启发,使他认识到图书馆除了开启民智外,还可以具有纪念功能。

民国肇造,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等事项,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要求“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sup>[7]</sup>,标志着以“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观念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也为梁启超提出为爱国英雄和著名学者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梁启超极度悲伤,哀呼“非夫人之恸而谁为”<sup>[8]</sup>。在蔡锷追悼会上,他讲到:“蔡公之美德虽系上天所赋,然国人使人人学习,将来如蔡公之美德精神均可发扬,而中国亦可渐臻富强,则今日大会为不虚矣。”<sup>[8]</sup>为此,他积极寻求一永久事业,既可以纪念蔡锷将军,又可以使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青年中广泛传播。同年12月6日,梁启超通电全国,称“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沪上同仁,议设一纪念图书馆”<sup>[9]</sup>,提出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思想。1924年,在纪念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诞辰200周年之际,戴震后裔筹建“隆阜东原私立图书馆”,梁启超作《戴东原图书馆缘起》指出,“邦人士正谋所以讲明先生之学而衍其绪者,而东原图书馆亦于是经始焉”<sup>[10]</sup><sup>[10]</sup>,大力倡导为著名学者建纪念图书馆。

梁启超被公推为松坡图书馆的筹办主任,在馆址选择、馆舍筹建、经费筹集和藏书建设等方面,事无巨细都亲自

筹划,身体力行。经过历时7年的竭力准备,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第一任馆长,直至1929年病逝。在松坡图书馆的创设过程中,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渐趋成熟。松坡图书馆“崇奉松先生栗主遗像,并广储中西图籍,任人观览,于以仰企先哲,嘉惠后来,籍崇拜之心,寓鼓励人才之意”<sup>[11]</sup><sup>[14]</sup>,是纪念馆和通俗图书馆的结合。可见,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最大的特征是赋予了图书馆“培养公德”和“开启民智”的社会教育功能,与当时大多数人秉承的以“开启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观念相比,具有开创意义。

## 2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的主要内容

### 2.1 纪念图书馆是命名对象的纪念馆

#### 2.1.1 收藏命名对象的有关资料

梁启超主张纪念图书馆首先是纪念馆,他亲自撰写了《松坡图书馆劝捐启》指出,“本馆永存,则蔡将军之精神随而永存;本馆光大,则将军之志事,随而光大。”<sup>[10]</sup><sup>[29]</sup>所以,该馆应着力收藏命名对象的有关资料,包括实物和书报,在《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中明确规定,松坡图书馆“除藏书外,凡蔡公遗著、遗墨、遗物,别设一室实藏之”<sup>[12]</sup>。

据熊月英<sup>[13]</sup>、郭英<sup>[14]</sup>等学者描述,松坡图书馆第一馆所在的快雪堂正殿辟为蔡公祠,供奉着蔡锷将军的灵位及云南护国运动中牺牲的将领汤睿、戴勛、熊其勋等8人的灵位。殿中的玻璃木盒内陈设着蔡锷的生前用品、文献、手迹、照片和在护国运动中用过的指挥刀等。该处成为纪念辛亥革命及护国战争英灵的纪念馆。每年蔡将军的忌日和1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梁启超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

#### 2.1.2 整理、研究、利用相关资料

梁启超主张整理研究蔡锷的相关资料,在经费问题严重困扰图书馆发展的情况下,仍拨款出版了《曾胡治兵语录》和《松坡军中遗墨》两部图书。其中,《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生前所辑清代曾国蕃、胡林翼关于统兵要领的言论,梁启超为出版此书书写了序文,即“惟此耿耿精神,当留存于国民隐微之间,可以使曾胡复生,使松坡不死”<sup>[15]</sup>,从而点明出书的宗旨就是传播先进精神,给后人留作永久的纪念。

梁启超还经常带学生到松坡图书馆举办讲座,用松坡等人的先进事迹激励青年,力求达到“登斯堂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焉”<sup>[10]</sup><sup>[29]</sup>的目的。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据他的弟子周传儒、吴其昌回忆:“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sup>[16]</sup>

### 2.2 纪念图书馆是开启民智、培养新民的重要机构

梁启超认为,纪念图书馆应广收西学和新学图书,面

向读者公开阅览,在开启民智、培养新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up>[12]</sup>。他在《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中声明:“本馆藏书分本国书、外国书两大部。本国书凡四库所有者,务设法以次搜罗完备。除购置外,有以家藏善本惠赠者,最所欢迎。外国书,英、法、德、俄、日文分厨度藏。各种科学、文学之名著,广为采置。其新出版者,随时购取。”<sup>[12]</sup>在他的领导下,松坡图书馆馆内藏书近10万卷,分为中、西文两大部分,中文以《四库全书》复本及杨守敬的24000多册古籍为主;西文包括英、法、德、俄、日等国家的名著,其中还有专门为留学生预备留学所用的读物。

为实现图书文化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在梁启超亲自拟定的《松坡图书馆简章》中明确规定:“备置中外图书,公开阅览”<sup>[11][48]</sup>,所有藏书面向读者公开阅览。为了方便读者阅览,他决定定期制作1种读书杂志的单张周刊,介绍藏书情况和阅读方法,并且把各种期刊也分类编目,以为读者提供最好的服务;还决定把每周的阅览成绩做成表格,定期送到《晨报》登出,并一度在第一馆内设立“松坡平民读书处”<sup>[17]</sup>,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阅读。为方便读者,松坡图书馆还实行了代办伙食的办法<sup>[18]</sup>,即在清晨开馆时,去看书的读者只要先在门房里登记后付两毛钱,中午就可以去食堂吃饭,使读者可以整天安心读书、埋头钻研。

### 2.3 纪念图书馆的发展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

梁启超认为纪念图书馆是公益事业,其发展应该“庶仗群力,共襄闾”。在松坡图书馆的筹办及运行过程中,梁启超非常注重利用其个人和蔡锷将军的“名人效应”,积极呼吁并寻求社会各界援助办馆所需经费、馆舍、藏书并参与管理。

#### 2.3.1 积极争取社会捐赠

在松坡图书馆创办之始,梁启超首先致电浙江、江西、湖北、四川、陕西、河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苏等省督军和省长,请求帮助和支持,又在上海《申报》发《创设松坡图书馆公启》等文,号召民众中“其怀思蔡公而热心公益者,共策群力,以观闾成”<sup>[19]</sup>，“所捐不拘多寡,务求普及,使人人得遂其纪念先烈之诚”<sup>[20]</sup>,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陆续收到募捐款数万元,收集图书数万册。1922年,又恳请黎元洪总统“于北海内指定地点官屋拨充图书馆之用,以资提倡”<sup>[21]</sup>。黎元洪总统给予批准,并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拨予松坡图书馆,解决了松坡图书馆馆舍问题。

此外,梁启超还把视线投向了国外,积极寻求华侨和留学生的支持。1920年3月,梁启超以“北京旅美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图书俱乐部”,将该部搜集到的6000多册外文图书连同“尚志学会”和“亚洲学会”搜集的2000多册日文图书全部捐赠给松坡图书馆。梁启超还写信给其在缅甸任外交官的女婿周国贤,提出:“南洋商界思仰松公功德者,想复不少,请弟力为募集”<sup>[22]</sup>,请他带领南洋华侨

为松坡图书馆募捐。

为表示对捐赠者的感谢和尊重,激发社会各界捐赠的积极性,他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在《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中对捐赠的办法和奖励规则作了详细规定,如对于捐赠者“芳名和所捐数目登报表彰”<sup>[12]</sup>,并将捐赠开支登报公开,详细内容刊印后反馈给各位捐赠者。

#### 2.3.2 吸取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参与管理

梁启超意识到人的素质是办好图书馆的重要条件,主张吸取关注松坡图书馆的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参与管理。在他亲自拟定的《松坡图书馆简章》中第2条规定:“本馆设干事三十二人,除以创办人充任外,嗣后如有续加干事,应由干事会多数公推”,第4条规定:“凡捐助该馆资财、图书及对该馆特别尽力者,由干事会推举为维持员”<sup>[11][48]</sup>遇有大事商议时,邀请维持员参加共议。这些干事和维持员来自社会各界,多为资深绩广、在民众中有相当影响的人,如教育总长任可澄、国立北平政治大学校长江庸、北平民国大学代理校长徐佛苏等,都做过该馆的干事,留学欧美归国的大诗人徐志摩、留学日本归国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傲、留美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及孙伏圆等人都做过该馆的维持员。这些干事和维持员都是“名誉职,不支薪津”,他们以公益为怀,以其见识和学识凝成一股合力,为图书馆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 3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新时期,分析、研究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在馆藏建设、经费来源和管理模式方面的经验,对于名人图书馆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3.1 设置纪念图书馆是解决当今中国缺乏有效名人资源保存机制问题的良策

目前,我国出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家、一些创建新中国的老革命家等著名人物相继谢世。他们的离去带走了诸多领域中先知者的光芒,却留下了记录他们人生轨迹的珍贵史料,其涉猎之丰、内容之珍、孤本之贵,叹为观止。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名人资源保护机制,加之名人资源又多具有私人性质,很多珍贵的材料都保存在名人的家人或其亲友手中,处于自然分散状态,大多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有些即使采用捐赠方式,也往往是部分捐赠,或分散捐赠到不同机构。这种现状已经造成了一些珍贵档案资料的损毁、散失,继续下去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为纪念著名人物而创建以其名字命名的纪念图书馆,注重对命名对象相关资源的系统收藏,不仅能收集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可以安全有效地保存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最大限度地弘扬命名对象热爱祖国、艰苦创业、敬业乐群、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传播他们的科技、文化成果。目前我国仅有少量的纪念图书馆,对于

兴建纪念图书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还没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和引导纪念图书馆的建立。

### 3.2 纪念图书馆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提供了思路

学术大师和革命家等著名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使与其相关的事物都笼罩了一层光环,从而使纪念图书馆更容易获取人们的认可和青睐。相对于其他图书馆,纪念图书馆易于吸引更多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混乱,令人担忧。社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sup>[23]</sup>。青少年从自我迷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不愿意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认,而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认同则可促进年轻人的自我思考和励志<sup>[23]</sup>。

纪念图书馆通过图片展览、实物展示、声像资料播放等形式使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命名对象在学习、为人处事等方面的良好习惯、科学方法和崇高品德,并将命名对象作为榜样。纪念图书馆在收藏命名对象资料的同时又收藏满足读者基本文化需要的资料,使读者陶冶情操的同时能够获取科学文化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 3.3 纪念图书馆为构建公有制为主体、多体制图书馆共同发展的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图书馆经费的划拨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在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sup>[24]</sup>的要求,强调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业要重视市场因素的作用,采用灵活体制。

要想使更多的民众都能够平等、自由地使用图书馆,现有图书馆必须改变思路、解放思想,利用包括名人效应在内的一切有利因素,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积极争取企业、海内外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图书馆的赞助或捐赠,在公立图书馆之外,大力发展私营图书馆、公办民助图书馆、民办公助图书馆、企业图书馆和基金会图书馆等办馆模式,构建公立图书馆为主体、多体制图书馆共同发展的体系。

### 3.4 纪念图书馆对于吸纳读者的智慧、补充和改进服务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利用纪念图书馆命名对象的影响力,设法吸引来自不同层面、不同职业的关注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图书馆的管理中来,可以使他们积极表达出各种与信息资源有关的需求,从而使图书馆服务能及时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增强图书馆活力。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上的每个用户不再仅仅是互联网的读者,同时也成为互联网的作者;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这就使关心纪念图书馆发展的力量不仅局限于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这些杰出人物,从而使纪念图书馆吸纳更多读者的智慧来补充和改进图书馆服务成为可能。作为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纪念图书馆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积极鼓励并邀请用户参与到他们所需要的实体和虚拟服务之中,如允许读者召集即兴的读书讨论等。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
- [2] 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14.
-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38.
- [4]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555.
- [5] 《清议报》第17期(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外论汇释”[M].影印本.台北:京华书局,1967:15-16.
- [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0.
- [7] 王振鸣.图书馆法规文件汇编[M].保定:河北大学图书馆学系,1985:5.
- [8] 曾业英.蔡锷集: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513.
-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847.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2]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379.
- [13] 熊月英.中国南北两“松坡图书馆”史实钩沉[J].图书馆,1995(3):70.
- [14] 郭英.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4):139.
- [15] 曾国藩,胡林翼.曾胡治兵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2.
- [1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140.
- [17] 行知.行知书信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32.
- [18] 徐铸成.旧闻杂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3.
- [19] 周秋光.熊希龄集:中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027.
- [20] 王会娟.梁启超筹办“松坡图书馆”未见著录的一封信[G]//郭长久.梁启超与饮冰室.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72.
- [21] 郭一梅.北京档案史料[J].北京档案,1994(3):33.
- [22] 郭双林.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N].光明日报,2010-10-12(2).
- [23] 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J].青年研究,1999(7):2.
- [24] 范周.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EB/OL].[2012-02-02].[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1/15/content\\_969212.htm?div=-1](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1/15/content_969212.htm?div=-1).

#### [作者简介]

姬秀丽 女,1971年生,硕士,现工作于泰山学院图书馆,馆员,已发表论文数篇。

[收稿日期:2012-03-02]